

《盛世危言》著者自印本发现记

■四川成都 肖伊律

《盛世危言》，是清末维新派先驱思想家郑观应(1842—1921)撰写的一部倡导自强求富、维新变法的重要著作，于清光绪二十年(1894)正式出版，流行版本多达数十种；直至辛亥革命，该书畅销近20年，印量可能达到数十万册。该书内容包括建设现代国家和解决当日危难的所有问题——明确提出仿照西方国家法律，设立议院，实行君主立宪，指出国弱民穷根源乃在于专制政治。除大力倡行民主政治与工业文明的引进之外，该书所提革新观念和“以商立国”商战理论，对中国近代思想史及商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正因为影响深远、好评如潮，《盛世危言》又成为近代中国版本最为繁多、最为混杂的名著。由于著者郑观应本人屡次修订、重印这一著作，各地出版机构更蜂起迎合，大肆翻印该书，甚至自行改变卷次、增删文章，人为地致使《盛世危言》版本十分繁杂。

经多年梳理与考证，学术界已经基本厘定最具权威性、代表性的《盛世危言》文本，主要有三种：光绪二十年(1894)的5卷本、光绪二十二年(1896)的14卷本《盛世危言增订新编》和光绪二十六年(1900)的8卷本《盛世危言增订新编》。对以上这三个版本相关的整理校订工作也已基本完成，可谓“尘埃落定”。但除了文本内容有了较为全面的校订之外，对于上



郑观应自编自印的14卷本《盛世危言增订新编》(内页)

述这三个版本的具体形态、出版细节等信息，对于普通读者而言，难免仍是一头雾水，不明就里。

纵观目前存世、已知《盛世危言》各种版本，可知著者最初于1894年春出版5卷本。1895年初，著者以5卷本为基础，改编为《盛世危言统编》12卷稿本，并将此稿本送交江苏布政使邓华熙奏呈光绪帝。光绪帝“御览”后，迅即命总理衙门印制两千部，分发给大臣“内部传阅”。同年秋，郑观应推出由《易言》36篇本脱胎而来的《盛世危言续编》。1896年上半年，他又将45篇续写的文章编成《盛世危言补编》出版。到1896年下半年，他将“统编”与“补编”合在一起，并增入新写的两

篇，出版收正文达104篇的《盛世危言增订新编》14卷本，是为该书“定本”。

这部14卷《盛世危言增订新编》，是《盛世危言》文本内容的最终“定本”，又是曾经光绪帝首肯的“御览本”，且为著者亲自校订并授权印行的“自印本”，一直为国内藏书界、读书界所瞩目。之所以“瞩目”，除版本珍稀、校订精审外，最重要的原因乃是该书已知均为“公藏”，私人收藏者鲜见。

近日，笔者有幸寓目一部原藏于上海工业专门学校，递藏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现已流入民间，为上海某藏家私人藏书的14卷本《盛世危言增订新编》。这部一直难睹真容、世所珍罕的著者自印本之诸多历史细

节，就此浮出水面，纤毫毕现。

这部14卷本《盛世危言增订新编》，分八册装订，封面笺条为李盛铎(1859—1934，号木斋，著名藏书家)所题。首册扉页，则印有著名画家吴昌硕篆书题写书名“盛世危言”四字，扉页背面署“乙未秋八月吴俊卿”。首册首页及次页为“奏稿”，印有江苏布政使邓华熙呈御览的奏折全文，该奏折末尾红印“朱批：知道了，书留览，钦此”字样，为光绪帝“御批”。

这部书首册首页右下角钤有“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图书馆”朱文方章一枚，末页左下角钤有“交通大学上海学校图书馆章”朱文长条形章一枚，可知该书最早曾为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上海工业专门学校(1921年时改称交通大学上海学校)收藏。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这部书首册扉页吴昌硕篆书题笺的背面署款之侧，有毛笔手迹“郑陶斋捐”字样。这四字之侧，即为该书首页“奏稿”，此页右下角即钤有“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图书馆”朱文方章一枚。据此可以推测，这部书极可能是著者郑观应捐赠给上海工业专门学校的，故有此标识。

值得注意的是，首册著者自序与著者后序末尾所钤印章，均为著者私人印鉴，可能具有一定的授权意味。这是为了防止坊间盗印翻印的有效举措，类似于后世版权页均须钤盖著作者印章的做法。目前已知，被公认为最早使用版权印章的严复，其著《英文汉诂》后

附专门印制的钤有著者印章“严氏版权之印”的版权页《英文汉诂》为光绪三十年(1904)初版，也比这部《盛世危言增订新编》的郑观应印章钤盖时间晚约8年。换句话说，郑观应才应当是中国近代最早使用版权印章者；而最早将版权授权付诸实施的出版物，正是这部《盛世危言增订新编》。

200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曾将上海图书馆珍藏《盛世危言增订新编》影印出版，有报道称原书著者自序与后序末尾所钤印章“证明这部书为郑观应本人生前珍藏”，这一观点无疑是欠妥的。就笔者目前所见，该书公藏私藏中出现著者自序与后序末尾所钤印章已非“孤例”(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藏本亦有这两枚钤印)，且钤盖位置均一致，只能证明，这两枚私人印章的使用，与版权授权有关。

最后，还须补充说明的是，这部流入民间的“公藏”珍本，每册正文首页右下角还钤有“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藏书章”朱文长条形章一枚，且每册首页均贴有条形码及编号，书中亦间或盖有该图书馆蓝色编码戳记。据此可知，该书在著者郑观应捐赠上海工业专门学校之后，还曾递藏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历经百年轮替，不知因何缘故，近年又流出馆外。或许，无论于公于私，这样的珍本能与后世读者有“面晤”之缘，尤其是能让那些无缘进入公立图书馆善本库的普通读者近距离得睹秘笈真容，总是一桩令人莫名快慰的曼妙书缘罢。

周越然藏书露出冰山一角

■四川 达森

几部周越然藏书曾上拍西泠印社2013秋拍会古籍善本专场，这说明著名的周氏“言言斋”旧藏在历经抗战前后的焚书与捐书之后，并没有完全销声匿迹、杳茫无踪，而是在民间尚有遗绪流传，周氏旧藏的冰山一角，正在悄然浮现。

周越然(1885—1962)，原名周之彦，字越然，浙江吴兴人。清光绪三十年(1904)秀才，南社社员。曾任商务印书馆函授学社副社长，兼英文科科长，以编著《英语模范读本》闻名，也因此书的常年畅销而获得巨额版税收入。版税收入颇丰的周氏，因其喜爱小说、弹词和评话之类图书，开始大量购藏与研究，并为之建造藏书楼。这些图书均属“言”部，遂将藏书楼名为“言言斋”。周氏言言斋为一幢西式之二层楼房，地处上海闸北，收藏有线装书3000余种、178箱，内中

以宋元旧版、明清精抄闻名于世，还有西文图书约5000册，积10大橱之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清末吴兴宋楼藏书散出之后，东渡之前，周氏得其八种，内有宋纂图互注《南华真经》、稿本《吴兴蚕书》、明初本《管子》、吴钞《疑狱集》、丁钞《栲栳山人诗集》等。其中明人写本宋岳珂《愧郈录》15卷，为祁氏澹生堂藏书，有澹翁手跋及毛子晋、季沧苇、朱锡鬯等印记。但所有这些珍藏，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之后，在日军的轰炸中，几乎全部化为灰烬。

虽然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藏书随着国难变故大部毁损，内心沉痛，言言斋旧藏的往事种种，已不堪回首，但此后作为藏书家的周氏，仍然一遇书缘，便心生购藏之愿，言言斋续藏随之而来。到1937年“八·一三”战事初起，上海又多有家藏书家不得不卖书为生，周氏于街头巷尾每每遇到这些流散藏书，都会仔细查阅，遇到实在有

割舍不下的珍本罕本，想方设法也要购藏。言言斋旧藏荡然无存之后，周氏藏书又在点滴积累中，渐成规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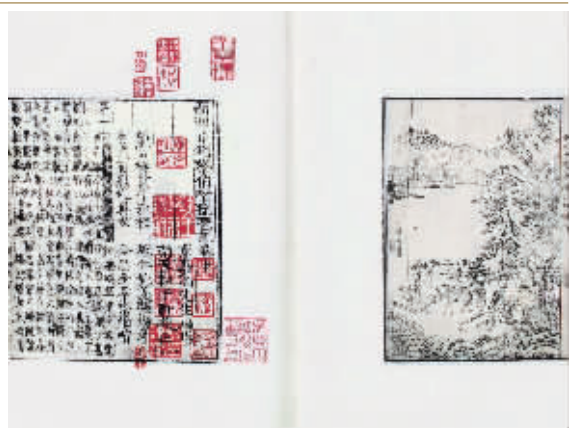
这批劫后得得的周氏藏书中，戏曲古本之规模十分可观，如《西厢记》《琵琶记》等名剧，他都藏有多种版本，特别是《西厢记》，他竟藏有15种版本，其中有半数为明代刊本或写本，足可与郑振铎的此类收藏相媲美。此外，其戏曲收藏中还有很多稀见之本。其中《金锁记》《上林春》《翡翠园》《十义记》《金貂记》等为王国维旧藏。如今国家图书馆推出的“再造善本工程”所影印《盛明杂剧》明代原本，也是言言斋旧藏之一，此足见其藏书的博大精深。

据周氏后人所述，1957年的大宗捐书可能与当年“反右”运动有关，在此期间，周越然与郑振铎的一次密谈，或对此次捐书有直接影响。虽然当年情状难以确考，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周越然

在1949年之后因“历史问题”确实受到过歧视与审查，有可能就名列所谓“右派”内部名单之上；而早在1957年之前，可能就有过零星捐书之举。当然，这算是题外话，但对于了解言言斋旧藏在抗战胜利之后的具体情况与最终去向，也有一定参考价值。

综上所述，可以大致确定言言斋旧藏在抗战胜利之后的去向，即1957年的集中捐献为大宗，复旦大学图书馆、上海市图书馆等处应有收藏。但仍不能排除，1945—1949年间，周还曾有过捐献之举，抑或此时旧藏本来就已有所散失与流转。直至其逝世之后，送往“废品收购站”的那批书，是言言斋旧藏的最后一次集体消失。

2013年现身拍场的，至少有四部言言斋旧藏(尚有未钤藏印，可能也为其旧藏的数部)，就足以与公藏善本并美的。一是明万历刻本《顾仲方百咏图谱》；二是清康熙刻本《祭皋陶杂剧》；三是清同治刻



周越然旧藏民国董珂罗版《元本琵琶记》

本《幽梦影》；四是民国董珂罗版《元本琵琶记》。明万历刻本《顾仲方百咏图谱》，无疑是这四部言言斋旧藏中的最耀眼者。在这部白绵纸明刻本之上，遍钤“华亭顾正谊仲方氏、周越然、吴兴、吴兴周越然藏书之印、曾留吴兴周氏言言斋、仰周所宝、海内孤本、四明朱氏漱斋藏、上海图书馆藏”等数方珍藏印鉴，足见其珍重。这是一部极其珍贵的明代版画绝品，《中国古籍善本总目》著录有此书的三家公藏——国图、北图、上图，

皆海内顶级公库。且此册为初印，卷首序处钤有“华亭顾正谊仲方氏”白文印，即为明代著者顾氏自藏本，这却是绝无仅有的特例。此谱铸于吴中，苏州雕版历近千年延绵至今，宋元间《碣砂藏》即版刻于此，其版画工艺精巧，与歙县、金陵、建阳等地皆负盛名，此编即是吴中历代所作最佳，为精雅典雅一路先导。郑振铎《中国古代木刻版画史略》中称此图谱“开启了光明灿烂的先路……由粗豪变为秀隽，由古朴变为健美，由质直变为婉约”。